

中國 古代

房內考

〔荷〕高羅佩著

李零 郭曉惠等譯

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



R 12
530
10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
房内考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By

R. H. VAN GULIK

00512701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装帧 陶雪华

中国古代房内考

〔荷〕高罗佩 著

李 零 郭晓惠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75 插 16 字数 321,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0,000

ISBN7—208—00642—3/K·140

定价 28.00 元

内部发行

译者前言

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然而，这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汉学著作：由一个外国人讲中国，讲我们自己的事情。

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 1910—1967年)，是荷兰著名汉学家，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和马得勒支大学攻读法律和东方语言，1935年以研究印度、中国西藏和远东马祭的论文而获博士学位。之后，他一直在荷兰驻外机构中担任外交官，先后就职于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和吉隆坡，最后职务为驻日本大使。

作者汉学功力深厚，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译作和专著，如米芾《视史》译本(1938)、《中国古琴学》(1940)、嵇康《琴赋》译本(1941)、《明末义僧东泉禅师集刊》(1944)、《狄公案》译本(1949)、《春梦琐言》(1950)、《秘戏图考》(1951)、《棠阴比事》译本(1956)、《书画说铃》译本(1958)、《中国绘画鉴赏》(1958)、《中国长臂猿》(1967)及本书。这些书中，尤以《狄公案》译本和本书名气最大。《狄公案》译本在西方有“中国的福尔摩斯小说”之林(作者后来还写有自己构思的续作)，非常风靡。而本书则取材鸿富，研精虑深，在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这一问题

上,被西方汉学界公认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权威之作。美国学者坦纳希尔(Reay Tannahill)在其《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书中遍论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性生活,述及中国,几乎全取此书。她说,此书“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元价之宝”(455页),洵非虚誉。虽然此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是为了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偏见,但它的内容对中国读者也同样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作者所讲的许多事情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也已十分隔膜。

* * *

本书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副标题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644年中国性与社会的初步考察”,另外还有中文名称,叫《中国古代房内考》。我们这个译本是沿用作者的中文书名。

此书从性质上讲是一部从社会文和文化女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学术专著。就作者的经历和学术背景而言,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过去多偏重于琴棋书画和诗赋小说,很有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之风”或“玩古董气”。他怎么会想到现在这样一个题目上来呢?这就要说到他对中国明代春官版画的搜集。

在本书序言中,作者很坦白地说,他对中国古代的性问题过去一直是绕着走,觉得自己缺乏性学知识有如残疾人,不敢去碰。但是有一次,他偶然买到一套明代套色春官版画的印板,即《在管锦阵》,想把它印出来供有关学者研究,由此引发兴趣,才终于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写了《秘戏图考》,后又写了本书。所以讲到本书,是不能不提到《秘戏图考》的。

《秘戏图考》是一部研究明代春官版画的专著。该书最初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写,只想在前面加一个带有历史研究性质的导言,后来逐渐扩大开来,竟成为一部三卷本的大书。其中第

一卷是正文,系用英文写成。该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色情文献简史》,内容是讨论房中秘书和色情、淫秽小说,时间范围从汉一直到明,就是本书的雏型。第二部分是《春官画简史》,重点介绍八部春官画册。第三部分是《在营锦阵》,包括画面说明、题辞译文和注释。卷后附录《中国性词汇》及索引。第二卷是《秘书十种》,系书中引用的重要中文参考文献,用中文抄录,包括《洞玄子》、《房内记》、《房中补益》、《大牙赋》、《某氏家训》、《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风流绝畅图》题辞、《花营销阵》题辞。卷后有附录,分“旧籍选录”和“说部撮抄”两类。第三卷是影印的《花营销阵》原图。全书前面有英文导言和中文序(用文言文写成)。所有中、英文皆手写影印。作者认为该书不宜公开出版,所以只印了五十部,分赠世界各大学、博物馆和研究单位(参看本书附录二)。近闻香港已将该书影印出版。

* * *

此书初版于1961年,与《秘戏图考》是姊妹篇,但二者有几点不同。第一,此书侧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艺术鉴赏,与前者有分工,叙述历史部分加详,而讲春官版画反略,只占第十章的一小部分。第二,此书后出,距前书有十年之久,讲历史的部分不但独立出来,而且内容上有增补,观点上有修正。如作者增加了讲西周和西周以前、东周和秦的部分,其他原有各部分也补充了许多新引文,修改了许多旧引文的译文,并采纳李约瑟的意见,修正了前书对道家房中本的评价,放弃了所谓道家进行“性榨取”的说法,因此显得更加完备。第三,此书是用来公开出版,面向广大读者,作者一贯强调爱情的高尚精神意义(参看书中对赵明诚、李清照爱情故事的描写),反对过分突出纯肉欲之爱,对正常的性行为与交态反常的性行为(施虐与受虐,排粪尿狂,兽奸)件有严格区分,故对本书行文、版图和插图的选择极为慎重。如作者把某些引文中涉及性行为的段落用拉丁文的生

理学词汇翻译,使其严肃性;版图、插图完全没有表现全裸或性交的画面。其中唯一两幅选自春官画册的版图,也是为了说明共艺术表现手法而专门挑出,一幅全身着装,一幅只裸露上身。全书没有超过这一限度的。

* * *

对性问题的研究,在现代西方已经形成专门的学科(Sexology),中国古代则叫做“房中术”。从研究文化史的角度讲,“房中术”是中国古代“实用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侧面。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实用文化”,主要包括以天文历算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学和养生术为主的“方扶之学”以及兵学、农学还有诗赋绘画和手工艺等等。战国以来的私学,即带有一定自由学术性质的诸子之学实际上是在这种“实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房中本本属于“方扶”四门之一(其他三门是“医经”、“经方”和“神仙”)。现在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表明,这种研究在古代是被视为上至于合天人、下至于合夫妇,关系到饮食起居一切养生方法的“天下至道”,在当时影响很大。过去我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囿于诸子之学,对中国古代实用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其中涉于“迷信”、“淫秽”的东西避忌太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外汉学界往往恰好是对这些方面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例如1974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之所以重视这些东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们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心理解是不可缺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拿诸子书中很有名的《老子》做一个例子。《老子》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道”是什么意思,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原书讲得很清楚,“道”是不死的“谷神”,“合神”就是“玄牝”,即一个“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天地万物所出的“众妙之门”。这显然是一种

与房中本密切有关的“地母”(earth—womb)概念。还有书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德”，核心是“守雌”，作“天下之牝”。为什么说作“天下之牝”，就是因为“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凡是熟悉古代房中术内容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些话正是来源于对性行为的观察。至于其他譬喻，如“婴儿”、“赤子”、“天下之溪”等等，无不由此引申。

西方汉学家利用我们忽略的材料而在某些研究领域里比我们先行一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例子，高罗佩氏的此书是又一个例子。

* * *

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巨幅画卷。(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批中文史料，有些是海外珍本秘籍，有些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旧籍中细心钩稽出来，工程庞大，作为一个外国人，实属难能。

从这些引书，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基本写作思路和内容安排的“虚实”。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一般旧籍。如讲西周和西周以前的第一章主要引用了《诗经》，讲东周的第二章主要引用了《左传》，讲秦和西汉的第三章主要引用了《礼记》。早期阶段史料缺乏，作者只好利用这类材料。另外，本书每章开头作为引子的历史概述，大多是据一般正史记载，针对的是西方读者，带有介绍性；各章中穿插了一些文学作品，如汉代歌赋、唐诗及宋词，除少数是直接关系到本主题的史料，很多只是用来“渲染气氛”。

(2) 房中书及有关医书。房中书是古代指导夫妇性生活的实用书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在初·本是极为严肃的书籍，并无消遣娱乐的性质。古代希腊、罗马、印度和现今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书。作者对历代史志著录房中书，皆考共撰人、书旨、篇帙和存佚之迹，一直穷追至明，然搜辑所得不过数种，只

有日本古医书《医心方》所引《洞玄子》及《素女经》等书引文、《大牙赋》、《房中补益》、《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这些书，《医心方》引书年代最早；收入第六章。过去国内只有叶德辉辑本，收入《双梅景阁丛书》中。叶氏所辑有遗漏，且打乱原书引用顺序，此书则是按《医心方》原书进行引述。《大乐赋》是法国伯希和藏敦煌卷子本，过去国内有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影印本和叶德辉《双梅景阁丛书》刻印本。《房中补益》出孙思邈《千金要方》，有《四库全书》本。这两种属于唐代，收入第七章。其他三种都是流入日本的珍稀之本，属于明代，收入第十章。由于这类材料比较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作者又自称对性学外行，想用史料本身说话，所以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有的甚至全篇抄入（如《洞玄子》）。

(3) 道家内丹派房中术的书籍。书中反复强调道家原则的重要性，但由于明《道藏》对这类书大加删略，作者实际引用的材料并不多，主要只有《周易参同契》、《抱朴子》、《云笈七签》和《性命圭旨》等几种。这种书与前一种书有密切关系，如《医心方》引抱朴子、冲和子之说，就属于道家言，故作者每每把二者视同一类。但此种书已从一般所谓的“合夫妇”、“养性命”发展为专以得道成仙为目的的秘术修炼，把女人当炼丹的“宝鼎”、而把“合气”、“采补”看作点化的手段，更加神秘化，也更加技术化。

(4) 唐代色情传奇。见于第七章。如《游仙窟》、《神女传》、《志许生奇遇》。这类材料书中引用不多，但有一定重要性。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性习惯和婚俗，还可视为后世色情小说的滥觞。

(5) 野史笔记。这类材料非常零散，寻找不易，但常常包含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如本书第六章讲中国的变态性行为，引用朱或萍洲可谈述沈括妻之虐待狂，引用赵翼《该余丛考》述南宋时期的男妓行会，引用陶宗仪《辍耕录》述春药“锁阳”，引用赵

翼《揄曝杂记》、谈迁《枣林杂俎》述淫具“辘轳”。第八章讲“龟”字的由尊而讳，引用王士慎《池北偶谈》、赵翼《陔余丛考》、俞樾《茶香室四钞》；讲宋代三等妓院，引用周密《武林旧事》、鬲得翁《都城纪胜》、吴子牧《梦粱录》。第九章讲元代宫廷中的喇嘛教密教仪式和所谓“欢喜佛”，引用郑思肖《心史》、田艺蘅《留青日札》、沈德符《敝帚斋余谈》。

(6) 明代色情、淫秽小说。作者把包含大量性描写的小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 *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说，指并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状写世情的小说，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类是 *pornographic novels*，即淫秽小说，指专以淫猥取乐，故意寻求性刺激的下流小说，代表作是《肉蒲团》，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三书。这两类小说虽然都有大量性描写，但性质不同。前者在文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地位，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后者则从内容上讲是庸俗的，在艺术形式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是享乐过度、厌倦已极的心理表现，有时情节反而是为性描写而设计。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承认，即使是后一类作品，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语言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性学的研究，也仍然是一种重要史料。

(7) 春官版画。作者曾经寓目的春官画册共有十二部，《秘戏图考》中介绍了其中的八部，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管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景》、《繁华丽锦》、《江南销夏》。本书只选择代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五部，没有讲《花管锦阵》、《风月机关》、《青楼景》。作者在此书中对春官画的起源、工艺手法和类型、分期做了简短概述，指出春官画最初是起源于房中秘书的插图，后来才单独流行，在形式上分手卷和册页两种，并且在上述小说兴起后，还以小说插图的形式出现。作者指出，春官版画的流行主要是在明末的江南，时间很短，只有八十年左右，但在屠寅、仇英的图样设计和胡正言《十竹斋画谱》

和《十竹斋笺谱》刻版技术的影响下，却达到了中国版画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作者在《秘戏图考》中文序言中说，这些画“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十洲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面人不烟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共谬也”。

(8)其他绘画和艺术品。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的“房内”生活有一种直观和亲切的了解，作者在每一章中还专门辟有讨论各时期服饰、家具和室内陈设的段落。书中许多版图和插图即为此而安排。它们当中有些是作者的私人藏品。

另外，作者还利用了许多西方汉学家、日本汉学家的有关论著，对他们的译本和研究在注释中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价。在本书附录一中还引用了许多西方和印度本国研究密教的论著。

对以上这些材料的讨论往往被分配在每一章中，各自成为独立的片断，可以互相对照，但因各章讨论的重点不同而散轻歌重，如房中书的讨论重点是在第六章，而色情、淫秽小说和春官画的讨论，重点是在第十章。为了眉目清晰，我们在这些片断的前面加了提示性的小标题，用方括号括起。这些材料以性问题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画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性问题是—个涉及到医学、宗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从生理到心理，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触及面极广，敏感度极高的问题。我想，每个稍具正常心理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一侧面从每个有关领域中—抽去，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会是何等片面和肤浅。

* * *

此书对于开展同类性质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目光，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下面是比较突出的几点。

首先,虽然正如上文所说,本书前几章从材料上讲很薄弱,如果让我们来写,往往就会感到无处下手。然而正是在这种地方,却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他能从晚期房中秘书的字里行间体味到它有一种渊源古老、始终一贯的原则,开卷一上来就讲中国人的基本性观念,指出它是以阴阳天道观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纲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切原始民族都远比现代人与自然界有更密切、更敏感的接触。他们总是把生命现象与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过程紧密相联,并从与自然更为接近的动物“学习”,求得与自然的沟通与协调。他们把自然、人与自然的媒介(动物)和人看作是一个交感互动的大系统,对它们进行了漫长而又细致入微的观察。所以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和有关的巫术、方术总是把服食(特殊饮食法)、行气(气功)、导引(形体锻炼)和房中(性交技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中发展出一种日益神秘化和技术化的体系,既带有一切原始思维的幼稚性,也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成份。正是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房中本才一再强调,夫妇之道乃是天地阴阳之道的精巧复制。这一点,我们从近年湖南长沙马王推出土的汉代帛书《养生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书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本书中,作者曾经猜测“假如《汉书》所载房中秘书得以保存下来,它们的内容肯定应与《医心方》所引内容是一致的。”上述马王堆帛书,抄写年代在汉文帝以前,成书当在更早,其术语和叙述方式与《医心方》引书极为相似,可以证明作者的猜测是正确的。

其次,过去许多研究领域都对性问题避而不谈,搞医学的不讲房中本,搞宗教的不讲密教,搞小说史的顶多提一下《金瓶梅》,搞版画史的也不理春官版画,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很多材料都在图书馆中尘封蠹蚀,无人知晓。不但“隔行如隔山”,就连本行都两眼一摸黑。与这种作法相反,

在本书中，作者不但把各方面的材料集中起来，而且能够注意各种问题的相互照应，比如房中本与道家内舟术的关系，道家内舟术与印度密教的关系，春官版画与色情、淫秽小说的关系，把有关线索串连起来，非常注意问题的整体关联，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循此做进一步探索。

第三，我们还应提到的是，作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讲求科学认真的态度。例如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时，作者总是一再强调，要从一夫多妻制的历史前提去理解。指出当时人们对两性关系、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婚姻的义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有特定的历史标准；中国古代房中本强调“一男御教女”的技巧掌握并不是随便提出来的，而是考虑到这种历史前提下男女双方的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和子孙繁育等实际问题。还有有些很小的细节，如《儿女英雄传》中男主人公安骥和女主人公何玉凤“阴阳颠倒”，这一现象在性心理的研究上很典型。作者为了说明何玉凤的“男子化”，就连书中讲何王凤站着撒尿这样一个细节都未放过，观察是很细心的。再比如作者对“回精术”的评价，一方面作者指出，没有射出的精沿脊柱上行是不符合生理学的，它们只会进入膀胱，而不会进入脊柱，但同时，作者又很慎重，说达也许是古代中国人对相关心理过程的一种模糊表达。书中涉及专门的医学知识，作者总是尽量引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如对“春药”，作者指出，它们大多并不含有有害成分，但亦无特殊效力，只有一般的滋补作用，中国人对春药的迷信往往带有性联想的夸大成分，个别药物甚且对人体有害。这些说法就是有可靠根据的。而作者在其知识不足以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总是把问题提出来，留给专家去解决，这也很有“多闻阙疑”的精神。

第四，作者学识渊博，除精通中文史料，还对印度和日本的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有可能对三种文化的有关材料进

行比较研究。如作者提到中国房中书、春官版画、婚俗、服饰、家具、室内陈设对日本的各种影响及其遗留痕迹,把许多现象,如中国的“颠声娇”与日本的“琳之玉”、中国的春官版画与日本的浮世绘等等做了有趣的对比。特别是本书附录一很重要,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房中本与印度的佛教金刚来和印度教性力派密教经咒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还牵涉到西藏喇嘛教和日本东密。隋唐时代的房中书与印度密教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回精术”和同样使用的“泥丸()”这个术语,这种相似很容易使人以为中国的房中术是外来的。特别是元代以来,人们往往把房中本的传授归立于“著僧”(参看《金瓶梅》),更使这种印象得到加强。作者不囿于成说,利用大量史料论证,中国的房中本远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完整体系,在年代上早于印度密教经咒,应是独立起源,而非外来;相反,印度密教经咒可能是在中国房中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以后又回传中国,影响到隋唐以来的中国居中本。虽然作者也承认,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假说。但这个假说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成立的:即中国房中术应当有其独立的起源,出土马王堆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 * *

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但既然是开创,当然也就仅仅是开了个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每一期性关系的总体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充分提高到足以做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此书仅仅是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以国内学术界的要求去衡量肯定还相当粗糙。很多有关的领域的研究者可能会提出非议。

从材料上看,本书前五章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前两章,涉及的是先秦时期,显得就更薄弱。先秦时期,不仅文字史料少,而且是个需要综合考古学、铭刻学等许多专门研究的特殊领域,

作者似乎在这一方面并不擅长,只能利用西方汉学界的某些现成著作。可是这些著作,从书中引用的情况看,大多比较陈旧,比如作者对古文字材料的运用基本上就是靠不住的。另外,作者引用《左传》,纪年推算亦往往错后一年,这些我们都加了订正性的译者注。

除去材料上的不足,作者还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专业的性学知识是外行,所以作者经常说把问题留给性学家去讨论。作者明确声明,他在本书中对产科学和药物学等纯医学问题不做讨论。这种不足,我们无法苛求作者。但本书对避孕问题完全没有谈到,这却未免令人遗憾。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性关系的研究确实太重要了。我们只要从避孕技术在西方“性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加以反观,便可想见这一点。

还有,作者在对中国性观念的评价上使用了“正常”与“不正常”的概念,强调中国人比其他古老文明更少反常行为;在对中国性观念发展的估计上也有“一向开放而突变为压抑”之说。这些提法,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和趋势性的估计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对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似乎缺乏充分估计,线条显得比较简单。

此外,还可顺便说一下,作者在第四章结尾把我国建国初期对“一贯道”的镇压与东汉政府对黄中军的镇压相比是很不妥当的。他在第六章中说叶德辉因刊印古房中书而为士林不耻,虽遭土匪杀害也无人同情,这种说法也对历史事实有很大曲解。关于后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叶德辉刊印古房中书虽对保存和整理古籍有功,但叶本人在政治上一贯反对革新和革命,在当地武断乡曲、生活糜烂。他的死,并不是被土匪杀害,而是因反对农民运动而遭镇压。读者可参看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岳麓出版社1985年)。

* * *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想纠正西方人认为“古代中国

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见本书序)。这一工作正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而且也为增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作者说，“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不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极具系统的房中本理论，而且一直到清代以前，性问题仍可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这些书“清楚地表明，从一夫多妻制的标准看，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见本书序)。

可是，这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性问题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而清朝却突然急转之下，一下子交得缄默不言、讳莫如深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回答，而是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禁毁之厄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当时统治当局禁毁书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讲明亡史实，被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危险；另一类是所谓“淫词小说”，罪名则是有害“人心风俗”。清人以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入主中国，力挽明代末年侈靡淫滥的亡国之风，的确显得很有魄力，但其禁书宗旨乃是“严绝非圣之书”(康熙五十三年谕)，不仅把上述色情、淫秽小说“淫词唱片”禁绝在内，就连《水游》、《西厢》这样的书也不肯放过，却也暴露了他们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极端脆弱。前一种书的禁止，是非早有定论，但后一种呢？大家却看得不大清楚，很少体会到这种“一干二净”，竟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无形的“暗伤”，这种精神上的“阉割”，其惨毒酷烈实不下于前者。

作者说，清代的禁毁之厄造成了中国人假装正经的淫猥心理，他们虚情矫饰，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垒森严，陷于自己编制的网罗而不能自拔。这种遮遮掩掩曾使当时来华访问的西方人大惑不解，以为其中必有污秽不可告人之处，辗转传说，

愈演愈奇。因此作者发出浩叹：“一则徒事匿藏，一则肆口诬蔑，果谁之罪软！”（《秘戏图考》中文序言）

这的确是本书留下的一个惹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在《秘戏图考》中文序言的结尾曾说，“海内识者，如有补其阙遗，并续之以明末以后之作，固所企盼”。

现在作者已经逝世二十年了，我们仍在等待着这样的著作问世。

李零 1987年8月10日